学术评论

让政治因素回归学术思想史研究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

张瑞龙

一、政治高压说与 20 世纪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在现代清学史上，政治史取向曾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特色。20 世纪初，当清代学术和思想即将成为“历史”，成为研究对象时，由于“反满革命”的现实关怀，满洲异族统治的政治高压成为解释清代学术和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原因，甚至清代学术和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精神、发展脉络及其呈现的学术形态亦由此决定。[①]外在的政治环境和清廷的高压统制，成为决定、影响和制约清代学术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清朝覆亡，“反满革命”说自然失去了其现实意义。民国初期，章太炎、梁启超相继修订、改写其在清末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清学史论著，删改那些“反满革命”等现实关怀浓重，甚或近乎政论性的文字，使之成为较客观的学术史著作。[②]不过，作为解释清代学术思想生存和发展重要理论的政治高压说，并未因此受到冲击或修改，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这一点在章太炎的清学史著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③]同时，这种客观化的处理也进一步奠定了“政治高压说”在清学史上的重要理论地位。

此后无论是持“理学反动说”的梁启超，还是从宋学角度讨论清代学术的钱穆，以及运用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级兴起理论探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侯外庐，关于清廷“政治高压说”影响和左右清代学术思想生存和发展的言论，皆屡见不一。[④]“政治高压说”成为清学史上各种理论和学说的重要“底色”，成为笼罩 20 世纪上半期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理论。

[**收稿日期**] 2015 - 03 - 05
[**作者简介**] 张瑞龙（1979—），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2；zhongruilong08@ ruc. edu. cn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 13XNJ023）“清代汉学考据兴衰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瑞龙：《学术与世变：20 世纪上半期清学史论述的形成与演变》，《齐鲁学刊》2014 年第 2 期。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自序”，第 2 页。

③ 参见章太炎：《检论》卷 4“许二魏汤李别录”、“学隐”诸篇，《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61—466，480—481 页。

④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28、71 页；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109—110，118—119 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 年，“引论”，第 20 页；第 313—314，591—592 页；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349，410 页。

在此过程中，清廷奖掖右文的政策和举措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将清廷统制学术思想的手段分为消极方面的威逼打压和积极方面的笼络利诱。尽管在相关论述中，清廷的笼络利诱政策被称作政治高压手段的补充和另一种形态的呈现，但这也使得政治高压说愈趋全面，能够容纳和解释更多的相关史事，而免削足适履之讥。后来的“政治外缘说”，则是这一理论更加客观化的表述。

但是他们在运用这一理论解释清代学术和思想变迁时，却暴露出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这只是外围的，对当时学术和思想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政治环境、统治局势和政治氛围的笼统描述，对这些因素如何实际参与、影响和左右清代学术思想的具体内容与发展演变，则没有深入核心的研究和探讨。仍是“塔外说相轮”，而未“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故到 20 世纪后半期，便有人对此理论提出质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1975 年余英时指出的，清廷的政治高压政策，如禁毁、改易书籍等，多限于史学方面，经学方面似乎没有太大影响，“集”部也是牵涉到“夷”、“狄”等字眼才触犯忌讳，真正讲理学的，不太犯忌。故政治高压说并不足以解释清代经学考证的兴起和理学的衰落，也无法解释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全部过程。① 余氏因此提出从学术思想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探究明清学术思想的转折和清代学术思想的流变。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更有多位学者探讨作为清代学术思想重镇的乾嘉汉学考据的兴起与清廷的高压统治尤其是文字狱间的关系，指出二者并无因果关联。尤其是清朝历次文字狱案的背景都非常复杂，案件的发生或因政治斗争，或因攀附权贵、献媚献策，其中还有很多是精神病患者，打击对象也以官员、平民居多，直接针对学人、士子者并不多见，故文字狱对学术思想界的影响不应过于夸大。② 在此情况下，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尤其是乾嘉汉学考据的兴起和发展，多被归结于清廷的积极提倡，因而清朝前中期诸帝和朝廷提倡、奖掖学术的文化政策与具体作为，尤其是清帝主持和发起的大规模图书纂修工程，备受学界关注。③

但正如运用政治高压说在解释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多流于对外在统治局势和政治环境的笼统描述一样，对清朝前中期朝廷奖掖右文政策的发掘、梳理和研究，虽然已具体涉及清代学术和思想的实际成果，但这一形态的政治外缘说，实质上仍是对清代学术和思想生存发展的外部政治环境的概括性描述，仍未揭示这些因素实际上如何参与学术和思想的发展演变。何况奖掖右文多是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肇兴之初或统治稳定后的常规或例行之举，它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兴盛和繁荣，但兴盛繁荣的究竟是何种形态的学术思想，其具体内容、学术精神和思想品格与此有怎样的关联，却未被进一步揭示。

因而就 20 世纪后半期清代学术和思想的实际研究而言，笼罩这一领域的，应是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但在传统中国，学术、思想与政治不仅仅是彼此缠绕且纠葛不清的，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是一体的东西。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主流形态的经学，不仅仅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也是培养、选拔士人的文本，更是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经学施之于学术则为经术，施之于政治则为政术。独立的学术和思想是近代西方科学昌明之后才出现的，是近代科学主义的产物，

---

① 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99—202 页；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 年，第 324—327 页。

② 周维衍：《乾嘉学派的产生与文字狱并无因果关系》，《学术月刊》1983 年第 2 期；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漆永祥：《乾嘉学术成因新探》，《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2 期；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第 68—81 页。

③ 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第 57—68 页；胡凡：《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 年第 2 期；雷平：《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 期；钞晓鸿：《明清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53—255 页。

能和政治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在传统中国，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术和思想并不多见。[①]

故单就学术思想论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说，亦不足以充分解释清代学术思想的渊源流变，且容易陷入所谓“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之讥。[②] 因而如何将政治因素重新回归、纳入清代的学术思想史研究，仍是清代学术思想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百年之后，需要重新探讨和认真审视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当下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越来越趋于细碎，越来越缺少共同的研究话题和新的研究进路。

二、《何处是江南》与政治史研究取向的回归

2010 年，长期从事晚清史和民国史研究的杨念群教授出版了一部研究清代前期思想史的专著《何处是“江南”?》，副标题是“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③] 该书从汉人士大夫与满洲皇权博弈的角度，探讨明清学术思想的转型以及清朝前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和精神面貌。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代表汉人文化最高精神和核心成就的江南士大夫，在经历明清鼎革和身处满人统治的境遇下，如何反思、保存、传承和发展原有的汉文化；第二，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满洲皇权和文化，如何在建立其统治合法性的同时，既保留满洲文化的独立性，又巧妙地改造汉人文化以收归己用；第三，在这两种文化和权力的博弈中，晚明清初学术思想的转型以及清朝前期的学术思想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脉络和不同面貌，进而士林的精神世界和思想特质因此产生怎样的变异。

书中关于后两方面的内容，已将清朝前期帝王的统治权谋和权力运作视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政治因素成为考察清代学术思想演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实际研究中，不仅士人被重新置入与政治的复杂纠葛中，政治权力、帝王心术、满人的统治模式、治理技术和统治理念等复杂的政治因素，都被纳入和参与到清代学术思想的演进，成为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重要对象。

在这里，政治因素已不再是外在的、笼统的，仅是构成清代学术思想生存和发展的背景性因素，而且成为实际参与、引导、影响和制约清代学术思想演进的内部要素。近百年来学界所关注的文字狱高压、禁毁书籍、奖掖学术等，在这里也只不过是政治权力控制、干预和规划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几种要素和表现形式，更关键的还有清帝的统治理念、政治权谋、统治技巧等更深刻的政治因素。这就极大地拓宽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和范围，已不再是对百年前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政治史取向的简单回归，而是开启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该书涉及的内容和问题很多，尤其是关于上述第一方面对江南士大夫在经历明清鼎革后，对晚明文化的反思以及如何在满人统治下生存的讨论，不仅加强了关于明清学术思想转型的研究，就这一部分内容所主要涉及的历史人物，如张履祥、吕留良而言，也无疑大大推进和深化了相关研究（第 20—148 页）。本文主要侧重于上述第二方面和第三方面的研究，亦即围绕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大一统”思想的建构，清朝前期帝王运用皇权建立统治合法性的努力，以及在此过程中（尤其是乾隆皇帝）如何控制和规划清代士人的精神世界，进而在皇权刻意且复杂缜密的全盘安排下，在与皇权的复杂博弈中，士人选择逃避政治，转向汉学考据，士人阶层的精神气质亦发生巨大变异的复杂历程。并特别就作者如何将政治因素具体纳入到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成为参与学术思想演进的内部要素，略作梳理和讨论。

---

① 黄振萍、高波、姜萌：《在清朝发现清朝——〈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对谈录》，《中华读书报》，2014 年 11 月 5 日，第 1013 期第 5 版。

②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80 页。

③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三联书店，2010 年。

（一）“教化帝王，反被帝王教化”：经筵会讲与清代士林精神的变异

经筵会讲是作者发掘的在制度层面清帝为建立其统治合法性和建构“大一统”的统治思想，通过对现行制度的巧妙利用和缜密安排，改变其原有的精神内核，将其变成服务于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这种从“道统”与“治统”的关系考察经筵功能的演变，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如所周知，经筵是宋代以来士大夫阶层试图教化皇帝，以“道统”驯化“治统”的制度性努力，宋明以来的士大夫还为此撰写了《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圣学格物通》等专门教化帝王的经筵教科书。① 但到了清代，经筵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本书第二章“礼制秩序的重建与‘士’‘君’关系的重整”的最后一节，特别对比讨论了明清两朝经筵的功能、士人与帝王教化角色的逆转及其体现的“道统”和“治统”关系的转变。作者着重描述了从明代士人掌控“道统”，并以之教化皇帝的种种努力，到清朝前期转而变成“治统”控制和指导“道统”的过程。从刚开始顺治皇帝的不怎么热衷，到康熙皇帝时转变和颠倒士人与帝王的教化角色，“治统”、“道统”合一，“经筵讲官不但失去了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权，而且还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帝王意识和思想的修正补充者，而不是思想灌输者”。最后到乾隆皇帝时“治统”完全征服和掌控“道统”，经筵所象征的“道统”竟沦为献媚和取悦帝王的工具，“不仅讲官的‘帝师’之位完全动摇，而且一般士人也已失去了其掌握儒家‘道统’的能力”。② 进而士人依据“道统”，批评现实政治的精神亦丧失殆尽，清代士林的精神世界也发生重大变异。这是从制度设计层面考察清代学术思想演进的一大发现。

关于清朝前期经筵的演变，我想补充三点：第一，学界所熟知的乾隆皇帝批驳程颐论经筵札子的意见（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征引而闻名），正好可成为乾隆皇帝巧妙利用并转变经筵的精神内核的重要佐证，因为这正是当事人的“心里”话。而乾隆皇帝所谓“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③，则是要斩断士人以天下之治乱兴亡为己任的儒家真精神，也是满洲皇权干预和改变清代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体现。第二，经筵至少在嘉庆朝已经成为政务运作的制度和工具。我在一项关于天理教事件与清朝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的研究中，发现经筵会讲的内容与当年帝国面临的统治形势和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成为清廷向朝野传达各种信息和统治意图的重要渠道。④ 这一过程是如何开启的，是不是在乾隆朝经筵就已经成为实际政务运作和帝国日常行政的一种方式？这一点虽有待考察，但我认为从乾隆朝已开始。第三，经筵会讲的内容，尤其是皇帝所宣“御论”，被编纂到《清实录》中，我留意到是从嘉庆初编纂的记载乾隆朝的《清高宗实录》开始的，而在记载此前顺康雍三朝的《实录》中都未出现。这一官书编纂内容的调整和扩充，是否也透露出一些信息？

（二）“拔赵旗，立汉帜”：文质之辨与清初诸帝的统治权谋

如果说经筵会讲是清帝在制度层面改变某种制度的精神内核，那么“文质之辨”则是清帝对士林流行的舆论和学术思想趋向的利用和引导，已是拔赵旗立汉帜的光明正大之举。其目的在于论证和建立满洲统治的合法性，甚至凸显其统治和满洲文化的优越性。本书第四、五两章“‘文质之辨’：帝王与士林思想的趋同与合流”，就是对清初“文质之辨”的重新讨论。

---

① 朱鸿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19，162—184，220—258 页。

② 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第 98、91—102，133—134 页。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第 2 页。

④ 张瑞龙：《天理教事件与清中叶的政治、学术与社会》，中华书局，2014 年，第 126—127 页。

关于晚明清初知识界流行的文质之辨的各种言论，赵园曾有细致的勾稽和精彩的讨论。① 但这一看似古老的学术思想性的讨论在加上政治元素后，竟会焕然新生，具有全新的研究价值和重大的历史意义，使我们对晚明清初学术思想转型、清初诸帝建立其统治合法性的种种努力以及清朝前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尤其是帝王权力和政治权谋对学术思想暗地里的利用、规划和引导，有更深刻的洞察和全新的理解。

清初知识界文质之辨的一个重要现实背景，就是晚明的迅速崩塌灭亡。一方面，清初士人对入侵的满人凸显其自身之“文”的优越感，对满人“质”的生活习俗暗含讥讽；但明清鼎革的惨痛经验和沉重教训，却使他们不得不对晚明士人各种“文”的言行作出深刻反思，因为“‘强力’‘武功’这些蛮夷行径恰是晚明士林精英圈中最不具备的行动要素”（第 192 页），于是“质朴”的满人生活形态与“军事力量强悍刚猛的形象”（第 164 页）以及“满人气势如虹般席卷江南的强霸身影”（第 184 页）叠合映现在了一起，“质”被重新认知和肯定，“尚质贬文”成为清初士林舆论的新趋向。这种“新文质论”不仅使士人对其行为进行自我规训，而且开始改变清初士林阶层的生活态度、交往习惯和学术走向，如对讲学聚会的逃避和抨击，对奢靡风气的厌倦和拒斥，对俭朴生活的向往和提倡，以及对礼仪规范和礼仪秩序的重建和实践，对礼乐制度的考订和探究，等等。

然清初知识界这种由“文”返“质”的思想主潮，却被清初帝王引导和利用，成为其建立满洲统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一方面，“尚质抑文”成为清帝击破江南士林对“质朴”与“蛮夷”关系想象的思想资源，而且是在江南文化的自身脉络内部找到的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清帝反复指责江南奢靡风尚，用江南话语改造江南风气，削弱江南的文化权威，消解面对江南汉文化之“文”的巨大心理压力和不自信，同时也凸显满洲文化优越性的重要武器。在此，满人统治的合法性似已无须论证，因为它已是应“运”而生的“命数”！

但面对江南精细雅致的生活风格（“文”），清初帝王并不能真正地拒斥江南文化之“奢靡”，相反却唤醒了其深藏内心的欲望和冲动。于是他们利用担任江南织造和巡盐御史的内务府包衣，贯彻施行一种“质表文里”的统治策略——表面上提倡、推崇“质朴”的生活方式，但在实际行动层面，清帝对江南奢靡风气的模仿和吸纳甚至已超过了明末的规模，形成口头谈“质”，行为趋“文”的复杂态势。这一统治策略不但严重影响了清代的言论走向，也使奢靡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种病态的形式被合法化（第 229 页）。

在学术层面，对礼仪秩序的重建、实践和对礼乐制度的考订，本是经历明清鼎革的清初知识界“由文返质”，对“文”的一种新的循礼敬教的实践。重建“礼治”，既是清初汉人在满人统治下传承儒家文明的艰巨使命，也是彰显其拥有文化正统性和权威正当性的重要方式。但这种新的学术取向和路径，也被清帝窥破隐微，并加以利用。清帝不仅对儒家经典谙熟至极，而且致力于对各项汉人“礼仪”的重建，而当满洲帝王的汉文化修养不亚于汉人时，汉人对礼仪拥有的文化正当性和权威性就被打破，“蛮夷”据有礼仪亦被自然合法化。

礼乐本是儒家经典中涉及相当专门化的乐理和仪礼规范等相当复杂的学问，也是历来经术研习的难点，但清帝如康熙、乾隆却在这方面频发议论，以彰显其非凡的经学素养和修为。这在实际上已不仅剥夺汉人对礼独占的诠释权，而且还造成一种汉人对满洲帝王在心理上的彻底臣服。清帝隆礼兴乐的各种作为，如康熙弘扬朱子理学，乾隆倡导“礼制”考据，均着眼于此。清帝对强化基层统治模式的探索，竟亦与清初遗民重建礼治秩序以修复“残山剩水”的行动默然契合，成为满洲皇权实施基层“教化”的舆论和行动来源。

---

① 赵园：《制度 · 言论 · 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第七章《文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51—384 页。

（三）入室操戈：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与清朝“正统观”的确立

孔子作《春秋》，是因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试图重建理想的统治秩序以待后王的无奈之举。在后儒看来，这既是儒家创立“道统”的开始，也是三代以后治道分离，儒者以“道统”规训和制约“治统”，以复三代之治的最高精神。《春秋》的大一统思想和夷夏之辨、尊王攘夷之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也因汉人帝国的统治现实和领土疆域，呈现不同的内容和面貌。

清朝以满洲异族入主中原，首先面临的是《春秋》的大一统之义和尊王攘夷、夷夏之辨精神。从清初摄政王多尔衮与南明督将史可法争论《春秋》大义，各取空间疆域和尊王攘夷之旨，不难看出入关之初满人在汉文化的精神义理层面论证其统治合法性面临的巨大窘境。如何消泯满人统治的“蛮夷猾夏”色彩，打破宋明以来以夷夏大防的种族之别界定“正统性”的文化阐释魔咒，无疑是清朝统治者的一大任务。从雍正以“空间”消解“种族”差异的努力，到乾隆以“疆域拓展”和“种族之别”两大要素来界定统治的“正统性”，并将攘夷观念历史化，暗用“大一统”之义消解“攘夷”的观念，用文化意义上的正统观取代以种族辨夷夏的狭隘正统观，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及其具有的礼仪文明形象由此确立。

但清帝的统治野心并不满足于此。因为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正统观”，对于王朝的兴亡更迭，其“治统”必须由“道统”加以控制和认定，而“道统”的解释权恰恰掌握在汉人士大夫手中。于是如何跟汉人士大夫争夺“道统”的解释权和归属权，便成了清统治者如何进入汉文化的精神核心，将其改造并收归己用的必然之举。最终完成这关键一步的，还是清朝前期的乾隆皇帝。这中间清帝也经历了复杂的探索过程。从康熙皇帝谨慎地将明朝历史和人物的是非功过，付诸士人官绅的“公论”，到雍正皇帝第一次公开否定私人纂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再到乾隆皇帝乾纲独断，将历朝历代以及史事和人物的是非功过、褒贬予夺之权，皆收归己有。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就是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

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也”，乾隆皇帝行使的就是三代圣王治道合一的历史审判权。他不仅超越了孔子，也超越了周公，是君师合一的三代圣王形象在当代的显现。所以乾隆皇帝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再三宣示其“斧钺之严”，称“体制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为法则”，“为万世昭公道”（第 281、273 页）。以至于长期以来春秋经筵上讲解的诸史和《通鉴纲目》等，在此时也变成学习乾隆皇帝本人的权威解释，而这又可与经筵中士人与帝王教化角色在清代的逆转相照应。

此时，清朝帝王已兼擅“治统”和“道统”，这不仅是三代以后的历代帝王无论是汉人还是夷狄皆未能做到之事，也是汉人士大夫所独立拥有的“道统”话语权的丧失。士人阶层所拥有的“道统”，不但丧失了监督、认定和规训帝王“治统”的权力，其对“道统”的阐释，亦需仰赖帝王的鼻息。这既是清朝中期的史学大家如钱大昕、王鸣盛等皆以考订史事自任，对所谓“褒贬与夺”的价值判断皆不自信或自我舍弃的现实背景，也是章学诚所谓清中叶学界有史考而无史学的深层原因。

以上是本书第六章《清朝“正统观”之确立与历史书写》，论述清朝前期帝王在确立本朝统治合法性的同时，如何在汉人文化的核心精神层面入室操戈，将其收归己用，以及其对清中叶学术思想和士人精神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陈永明新近出版的论著亦可补充作者的上述研究。在乾隆皇帝于三十三年完成《御批历代通鉴辑》后，又于四十一年和四十八年相继开启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钦定国史贰臣传》和《钦定国史逆臣传》的编纂。对明清鼎革之际抗清和降清诸多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以及满洲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过程，此前诸帝或刻意回避，或进退失据，乾隆皇帝此时则标举“为万世植纲常”的原则，进行重新叙述和历史诠释。这就彻底完成了对既往所有朝代、史事和人物褒贬予夺的历史审判，也使清王朝作为中国历史正统王朝的合法地位，不再受到质疑

和挑战。①

（四）拔本塞源：文字狱、查禁书籍与满洲皇权对汉人思想文化的大清洗

清朝正统观以及相应历史书写和评价标准的确立，使满清皇权在政治、学术和思想领域掌控了独有的发言权。如何使满清皇权确立的这些标准和规则，贯彻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对当时和后世，乃至对历史上传统存留的历史和文化遗产皆起到相应的规范作用，消除与此冲突或抵牾的文献记载和思想资源，确保这些价值、标准和规范的正确性、权威性和惟一性，实现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大一统”，便是接下来清廷面临的重要任务。

本书第八章《文字何以成狱?》，便是在这一逻辑环节上的展开。政治力量强行介入思想文化领域，干预和控制思想文化的发展导向，是清朝思想统制的一大特色，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狱。雍正、乾隆两朝是清代文字狱频发的时代。据作者考察，雍正朝的文字狱多与统治高层的权力斗争有关，并试图藉此消除“夷夏之辨”所造成的汉人的思想“背叛”和疏离“正统”。但乾隆朝的文字狱，却与清廷建立“大一统”的王朝整体规划密切相关，目的是彻底清除江南士人以“夷夏之辨”作为其民间合法性基础的传统，其背后更有满清皇室全盘性治理技术和长期精心设计规划的统治权谋。

在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皇帝“寓禁于征”，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收缴、查禁“违碍”书籍的办法和手段。在此过程中，查禁的范围和对象，也从公共流通领域的书肆、藏书楼深入到私人空间的细胞式个体家庭，从藏书家和士绅阶层延伸到普通民众甚至农耕文盲之家。晚明清初史籍、反清遗民著述、时人诗文日记以至八股试帖、时文选本，皆在监控、检查之列。收缴、查禁违碍书籍运动长达二十余年，严密有序的查缴方式和手段，不仅培养、训练和提升了督抚大吏的查禁嗅觉和侦缉敏感，也部分地改变了地方官府和基层组织的吏治结构和责任范围。长期反复的清缴禁书运动，不仅使中下层官吏查缴禁书的能力和觉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也给一般士子和文人以警策和震撼，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在文网繁密的压力下，不少遗民子孙被毫不知情地卷入一场场杀身之祸，也有不少江南士绅遭人攻讦而陷牢狱之灾。

这是一场对以汉人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清洗，也是彻底清除和解决那些不利于清朝统治和清廷“大一统”观念的思想、言论和记载的拔本塞源之举。纂修《四库全书》在版本和修纂技术等方面的“考据”需求，大大催生了考据学的兴盛。故作者将清代考据学视为清廷有意为之的政治步骤，是清代皇家政治对学术实施干预的结果。乾隆皇帝刻意提倡乃至率身垂范的经学考据，不仅改变了士林的学术走向，还形成了判断学问高下优劣的标准（第 393—395 页）。于是士人的思想、言论、生活和行动，便被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控制在满洲皇权的意识形态之下，士林的精神世界也在无形中发生了深刻变异。

如果说作者上述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力干预和统制思想文化领域的渠道、手段和方式，那么王汎森教授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则就文字狱政治高压对思想文化无所不在的影响，书籍禁毁所产生的“涟漪效应”，以及文字狱所造成的自我压抑和禁制现象，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为主题，对清代这种政治压力下的士人心态、写作、出版和藏书等方面形形色色的现象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对清朝前期士人的心态和精神世界的变异，有更深入切实和具体而微的了解。②《四库全书》对所收书籍的抽毁删改和清代官修书籍对大量历史记载的改篡隐没，③ 以及

---

① 陈永明：《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105—148，160—259 页。

②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第 393—500，603—611 页。

③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30—136 页；张佳：《元明之际“夷夏”论说举隅——兼说清代官修书籍对明初史事的隐没与改篡》，载氏著《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307—323 页。

私人领域在书籍出版和收藏方面的自我禁毁和改易删窜，更让我们看到清朝的正统观及其确立的标准和规则对传统存留的历史遗产和思想文化产生的巨大“规范”作用。

（五）心悦“臣”服：“六经皆史”与清朝“大一统”历史观建构的完成

章学诚及其“六经皆史”论，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显学”，几乎已到了“题无剩义”的地步。本书第八章《“经世”观念的变异与清朝“大一统”历史观的构造》则另辟蹊径，从清朝统治合法性和“大一统”历史观建构的角度对此做了全新的探讨。具体研究则不仅使章氏思想体系以及“六经皆史”论中一些隐晦不明或看似矛盾的思想观念获得新的解释，令人读来大有拨云见日之感；更将章氏思想纳入清朝政治权力干预下的学术思想发展脉络，将其视为清初以来满洲帝王处心积虑地收编、整合汉人学术思想，实现“大一统”等意识形态历史观建构的完成性标志，成为作者所谓清代士人积极迎合朝廷收编，与帝王合谋的最佳体现和典型之例。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打破了“六经”对“道”的独占和垄断，也是对古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突破。长期以来，学界甚至赋予其“思想解放”或“思想启蒙”的意义。① 但章学诚及其“六经皆史”论中浓重的权威主义色彩和坚定的推尊时王态度，却令人备感疑惑和不解，因其恰与所谓的思想解放背道而驰。故研究章学诚及其学术思想者，或对其称赞和主张思想禁制和查缴禁毁书籍的言论和观点视而不见，或将此思想和观念哀叹为满洲异族统治下的思想变异，或笼统地归结为清代达至巅峰的专制制度，然皆未能从章氏学术思想的内部或其居处熏染的社会政治环境做深入系统的探讨。②

作者将章学诚及其学术思想置于清朝统治合法性建构的脉络中加以探讨，系统搜集章氏推尊和称许本朝时王制度的诸多言论，将其纳入章氏“六经皆史”论的建构中进行归纳分析，尤其结合康熙和乾隆二帝兼擅治统和道统的野心和努力来讨论，将章学诚及其“六经皆史”论中许多看似极具超越性的思想和言论，在清朝现实的政治和文化层面找到相应的实例。此举虽有削弱章氏思想的超越性之嫌，但这在坚决主张“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章学诚而言，无疑是“达诂”和“正解”。

在作者看来，章学诚及其“六经皆史”论正是清朝“大一统”历史观建构完成的标志，也是清朝汉人士大夫心悦诚服地在理论和精神层面臣服和配合满洲皇权收编和控制的体现，更是清代汉人士大夫的精神特质产生深刻变异的象征。章学诚的方志学及其地方的基层治理理论，也是这一清代学术和思想演变脉络的体现。这一在清初遗民那里作为如何在异族统治下保存、传承和发展原有汉文化的地方社会治理的设想和努力，③ 到章学诚这里却变成如何呼应满洲皇权地方治理方案，急于纳入帝国政治和文化规划的诉求。

在关于章学诚及其六经皆史论的研究中，作者不仅将政治因素作为学术思想演进的内部要素，并以此发掘、梳理和呈现了清初以来在满洲皇权的统治权谋和政治干预下，清朝前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统一性和完整性。尽管这种思想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在我看来是一种皇权干预和政治高压下的特殊呈现，是压制的统一性掩盖了历史和思想的复杂性。但这无疑是对清朝前期学术思想的渊源流变极具洞察力的敏锐观察，其思路和观点值得学界重视。

我想补充的是，章学诚的地方志纂修与地方治理理论在“六经皆史”论中的地位。章氏思想和理论的核心是“六经皆史”，只有将其地方志纂修理论和实践纳入“六经皆史”论的框架

---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69 页；岛田虔次：《历史的理性批判——“六经皆史”说》，载氏著《中国思想史研究》，邓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356—357 页。

② 钱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8—9 页；倪德卫：《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132—133 页；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00 年，第 56—57 页。

③ 王汎森：《清初的下层经世思想》，氏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31—368 页。

中，关于章氏所谓“史学经世”等讨论才会有着落。但学界对“六经皆史”中“史”的理解，过于受章太炎，尤其是胡适的影响，用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史学去理解“六经皆史”之“史”，导致诸多扞格不入之处，甚至有严重的误解，当然这其中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因素。①

“记注之史”与“撰述之史”是章学诚“六经皆史”论的核心概念。所谓“记注有成法”是三代之时的周官之史，相当于后来的吏，因为有制度和体制的保障，这些档案和官书的存留，是系统、客观、真实的，所谓“史守掌故而不知择”，“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文史通义·史释》）。至于“圣哲神明，深知精微之极致”的“二帝三王”（《书教下》）制作典章制度，则是“撰述之史”。六经就是周公因“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以大备”的际会，“以天纵生知之圣”，“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原道上》），将三代盛时的“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经解上》）。所以他才说：“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亦即六经是周公撰述的关于三代的“撰述之史”。

明乎此，才可将章学诚毕生倾注心力的另一大事业——地方志纂修及其地方治理理论，放到“六经皆史”论中来理解，并给它一定的定位。在我看来，章氏地方志的纂修理论和实践，就是要在“官失其守”的“三代”之后的“当下”，恢复三代时“记注之史”的传统，其实质就是在三代以后“记注无成法”的状态下，变相地恢复周礼，尤其是周官中各种“史”的职能和精神，以此实现他心目中的三代之治，所谓“古代天地之纯”云云。要言之，在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中，地方志的“史学形态”就是“记注之史”，是“六经皆史”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人论章学诚“六经皆史”论，谓此论乃“六经皆史学”或“六经皆史料”者，仅看到此论中“记注之史”的一面，而未注意此“记注之史”在经世层面的功用和价值；称此论是“经世史学”、“尊史为经”者，则过于看重此论中“撰述之史”的一面，而未考究其赖以成立的基础和具体实施的渠道。故就章氏主张的“史学经世”和“六经皆史”而言，二者缺一不可。而作为“记注之史”形态的地方志纂修，更是史学经世的基础和具体渠道，也是撰述“以究大道”且能载道、媲美六经的“撰述之史”的制度性保障。

三、“合谋”还是“阴谋”？——兼与杨教授商榷

在完成上述从汉人士大夫与满洲皇权博弈的角度，发掘、梳理和探究明清学术思想转型和清朝前期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后，作者提出一个非常醒目且极具震撼性的观点，即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的是汉人士大夫与满洲帝王的“合谋”关系。尽管这种“合谋”有时是一种不期而然的结果，作者也对这些“合谋”关系的复杂性，做了充分的阐释：如在反抗异族和反思明代文化这两大任务上，汉人士大夫反明代文化的言论和行动，“恰恰可能演变成为新帝王统治的合谋行为”，称“尽管这种合谋并非是有意设计的”（第 391 页）；又如清初尊崇朱子学，汉人士大夫是检讨明末蹈虚空谈、讲学游走的士林风气对明朝灭亡所应负有的责任，清初帝王则是通过清算明朝统治的过失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但这南辕北辙的初衷，却使士人一方常常面临最终被王权话语收编的危险（第 392—393 页）。尽管如此，作者仍特别强调清朝“大一统”历史观的建构和汉学考据的兴盛，“不可以忽略士林与帝王的合谋关系”（第 396 页）。

“合谋论”清楚地揭示出明清思想转型和清朝前期学术思想演进过程中，民间的汉人学术思想演变与清朝的官方文化取向趋同的一面，也突出展现了在满洲帝王权力下，民间士人对官方权力的主动迎合与自我规训。但与此同时，也容易掩盖学术和思想演进的复杂性，尤其是作者在本书中特别强调的政治权力、帝王权谋与清帝的统治模式、治理技巧等对民间学术思想的干预、规

① 张瑞龙：《“六经皆史”论与晚清民国经史关系变迁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5 年冬季卷。

划和利用。

“合谋”还是“阴谋”？民间汉人士大夫的学术思想演进与清初帝王的官方文化取向趋同，是客观上各自形成的无奈现实，还是一方（清初帝王）对另一方（汉人士大夫）的潜在洞察和阴谋利用？

当然，无论是“合谋”还是“阴谋”，都是基于已知历史发展的“后见之明”得出的观感和总结。问题在于，哪种成分居多？这就需要回到历史“最初的‘无知之幕’，一步一步展向未来”①，按照历史发展的自然时序考察二者出现的先后关系。不过，这种先后时序的排定也是比较粗糙的，因为民间汉人士大夫的相关言论繁多且错综复杂，其在当时是否刊布且发生实际的影响，短时间内亦很难做出精细的考订。因而需要寻找一些关键年份或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关节点，以此考察二者出现的大致时序。毕竟清朝帝王的统治政策或官方文化取向的出台、调整或颁示，往往与实际的统治局势密切相关，其背后更因应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在实际研究中，本书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影响到学术思想和士林风气的变化，尤其是从清朝官方和民间汉人博弈的角度，也有所关注。如第一章曾讨论到明清鼎革的战乱、奴变与兵燹之灾对江南望族的重创，以及清初满洲朝廷借奏销案等以重手对江南望族的刻意打压，使江南士绅的生计成为严重问题，“治生”能力不得不放在首要位置，进而“出处”之难也变成了明遗民最重要的讨论议题。清廷处置这些案件时大加杀戮的血腥手段，也是以武力强力扭转晚明以来的士林风气，如称“因奏销而起的‘哭庙案’就更是透出江南士风曾经有过的张狂无忌风格的无奈消歇”。更何况清廷之所以重惩江南士绅，更是包藏祸心，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权谋——“目的显不在经济，而在收拾人心”（第43—50页）。

除上述顺治间和康熙皇帝亲政前共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外，作者还对雍正朝的曾静案、乾隆朝众多的文字狱案等予以充分关注。不过，我更注重康熙三十五年（1696）这个关键性的年份。是年，康熙皇帝御驾亲征，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取得决定性胜利，消除了帝国周边最后一支构成威胁的军事力量。内地各省封疆大吏和方面大员皆上贺表，庆贺康熙皇帝成此千秋帝业。② 此前，康熙二十年，平定绵延八年的三藩之乱；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彻底结束明清鼎革以来南方数省和东南海疆的战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经两番苦战收复雅克萨，并于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清俄东段边界，使东北边疆再无战事。③ 满清入关以来内忧外患、狼烟四起的统治危局终于结束，大清帝国的统治根基至此也终于稳固。

这一年不仅是大清帝国统治局势的重大转折，也是清廷偃武修文、锐意文治，致力于帝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契机。不同于此前开博学鸿儒科等带有配合武力征伐的色彩，④ 昭莫多之役后，康熙皇帝于是年七月颁谕增广各省乡试解额，这是清廷自顺治十七年（1660）将各省乡试解额减半以打压汉人势力，36年来的首次增广乡试解额之举，增幅且超过30%，从中不难看出康熙皇帝此时施政重心的转变。⑤ 更关键的是，杨念群教授书中“帝王也谈三代”一节，清初诸帝首次提出“复兴”三代的宏愿，亦在此后（康熙三十七年），且书中所引康熙皇帝

---

①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台北《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第183页。

②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1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15—25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92—94页。

③ 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册，第254—267页；第2册，第92—113，142—156页；乌云毕力格、成崇德等：《蒙古民族通史》第4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8—133页。

④ 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06年，第162—163页。

⑤ 参见谭红艳：《清前期文乡试解额变迁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朕向意于三代”之语（第 89 页），正是出自康熙荡平厄鲁特噶尔丹的御制碑文。① 至于康熙帝最隆重的尊朱之举，升朱子为十哲之次，更在康熙五十一年。②

以康熙三十五年为关节点，考察本书讨论明清学术思想转型以及清初学术思想流变所主要涉及的历史人物，不难发现书中征引言论颇多的那些汉人士大夫，其卒年多在此前。以卒年先后，依次为：谈迁卒于顺治十四年（1657），黄宗会卒于康熙二年（1663），钱谦益卒于康熙三年，吴伟业、方以智卒于十年，周亮工卒于十一年，孙奇逢卒于十四年，张履祥卒于十五年，陈确卒于十六年，魏禧、李邺嗣卒于十九年，顾炎武卒于二十一年，吕留良、朱鹤龄、施闰章卒于二十二年，汤斌卒于二十六年，王夫之卒于三十一年，叶梦珠卒于三十三年前后，黄宗羲卒于三十四年。只有少数几人卒于此后：唐甄、颜元卒于康熙四十三年，李颙卒于四十四年，邵廷采卒于五十年，戴名世卒于五十二年，李塨卒于雍正十一年（1733）。③

故就本书征引的明清之际和清初民间汉人士大夫的言论而言，多在康熙三十五年以前。因而无论这些言论如何错综复杂或是否产生实际影响，就其与清朝帝王的关系而言，除本书征引的康熙皇帝的一些言论，需在时间上稍作分疏外，至于雍正、乾隆二帝关于明清学术思想转型以及清初或清前期学术思想流变的诸多言论和观点，多为对此前汉人士大夫言论的引导或利用，即多为“阴谋”，而非汉人士大夫与其“合谋”。如本书讨论乾隆皇帝与四库馆臣抨击明末讲学和朋党之害的诸多言论与清初明遗民反思明末士风的意见相当接近，称二者是“无意识的合谋”（第 84 页）。但如果考虑到二者出现的时间先后以及清帝对士林风气和学术思想走向的密切关注，则不难发现实则是清朝帝王和官方对民间舆论的引导和利用，是“阴谋”，而非“合谋”。故就本书所讨论的“合谋”关系而言，顺治间和康熙前期多为无意识的“合谋”，康熙后期和雍正、乾隆两朝则“阴谋”居多，而“合谋”为少。这也是我在上文概括叙述本书主要内容时，多用“利用”、“引导”等词的重要原因。

其实，关于清朝帝王对士林舆论和学术走向的潜在观察和阴谋利用，当时的朝鲜人就有敏锐的警觉和深刻的观察。如对康熙皇帝和清前期朝廷的尊朱之举，朴趾源就说：“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彼岂真识朱子之学而得其正也？抑以天子之尊阳浮慕之？此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姑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④ 异域之眼有时尽管只是管中窥豹，但因没有中土士大夫在清代政治高压下的戒慎恐惧，往往能帮助我们掀开帝国统治帘幕的真实一角。

这种“阴谋”利用关系，正是本书作者揭橥的清朝帝王和官方运用政治权力、统治权谋以及帝国的统治模式和治理技巧等对民间学术思想的干预、规划和引导、利用。故无论二者是“合谋”关系还是“阴谋”利用，这种将政治因素作为学术思想演进的内部要素来探讨的做法，无疑是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

① 玄烨：《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 3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8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652 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 249，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丁巳。

③ 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第 799—831 页。

④ 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年，第 218—219 页。

四、结语：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政治史研究取向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传统，但作为这种传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高压说”，虽是清学史上各种理论和学说的重要“底色”，且曾笼罩20世纪上半期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但终因其仅是清代学术思想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外在的背景性因素，而逐渐失去引导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性地位。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朱维铮非常敏锐地指出满人统治尤其是清朝前期诸帝的统治心术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重大影响，他还极具启发性地将其称为“以汉制汉”的“文化分裂”政策，并以此探讨和解释清代汉学考据的兴起。[①] 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尤其是对这一政策的基本内容、实施途径、展开方式以及实际效用等未做进一步讨论，故仍只是一种极具启发性的睿见而非实质性的研究。

杨念群教授《何处是江南》一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开拓性地将清朝帝王的政治权力、统治权谋、治理技巧和权力运作等政治因素作为清代学术思想演进的内部要素，重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政治史研究取向；更关键的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和重新起步，而是真正深入历史的核心和内部，重新审视帝王、士人以及学术、政治和思想的复杂与纠葛，并形成对明清学术思想转型和清朝前期学术思想渊源流变的结构性系统研究和整体性概括解释。这不仅极大拓宽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和范围，更开启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钱穆对历史上关于各项制度得失的认识和评论，曾有“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之分。[②] 借用此概念，20世纪初年在“反满革命”的现实关怀下，满人统治影响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各种言论，无疑是当时最强的“时代意见”。但这一当年看似刻意而发的“有为之言”和“时代意见”，竟成为窥见清代政治与学术关系隐微的石破天惊之举，成为极具价值的“历史意见”。我在一项讨论清朝中叶明史认识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③] 这就提醒我们当研究对象开始成为历史时，那些色彩鲜明的“时代意见”，似乎更值得后世研究者珍视。

就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而言，杨念群教授此书所揭举的政治史研究取向，虽然是20世纪初年清代学史论述中最普遍且最具特色的言论，但也只是当时众多的学术流派和历史解释之一。如何进一步开拓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广阔路向和多元取径，这些“时代意见”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如何仔细剥离其与时代的复杂关系，汲取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并做创造性的转化，这是留给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文章承清华大学黄振萍副教授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

① 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1988）、《求索真文明·题记》（1996）、《汉学与反汉学》（1992），载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9—10，17—18、35—36页；《题记》，第7页；并参朱维铮：《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1987），载氏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0—151页。

②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前言”，第6页。

③ 张瑞龙：《从鉴戒到取法——清嘉道间对明代士习风俗的评论与再定位》，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8期，2014年1月。